

上海师大方广钊等主编的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 在世界敦煌学研究领域堪称里程碑——

历经浩劫 敦煌遗书精华仍在中华

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,与殷墟甲骨、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,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。由于历史原因,不少敦煌遗书先后流散到了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国。

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,上海师大哲学学院教授方广钊、英国学者Frances Wood(吴芳思)主编的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前10册最近出版,全书将共约出版100至120册。近日在沪举行的“敦煌遗

书整理成果展示发布会”上,展示了由任继愈主编的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(全书约150册,已出版142册)、方广钊等主编的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前10册,被称为世界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



本报记者 王蔚

遗书流散多国是民族之痛

全世界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,方广钊教授已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,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人,这在敦煌学史上是空前的。因此,说起敦煌遗书,方广钊如数家珍。“敦煌遗书的流散,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。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,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一系列探险活动,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,他们从中国盗走了大量文物,包括敦煌文物。”

方广钊介绍说,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,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各有不同。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,像美国的华尔纳;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,像英国的斯坦因、法国的伯希和;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,部分是在莫高窟收集发掘的,像日本的大谷探险队、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。

“敦煌遗书的发现,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,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,怎么比喻也不过分。”方广钊说,敦煌遗书的流散,是我们民族的不幸,任何一个中国人讲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,所以就在学界留下了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的说法。不过,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,却促成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。但这不是说那些探险家就有功了,这是两回事。也不是说,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,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。历史是无法假设的。

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曾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、盗窃,这并不科学;现在,则美化斯坦因、伯希和等探险家,我认为这样很不好。”方广钊说,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,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工作,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,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、文物保护意识。

北图的遗书数量多质量好

长期以来,学界有一种说法,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,剩下的都是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。对此种观点,方广钊做了分析和澄清。

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。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都捆扎成包,王道士成包地给他搬。王道士给什么,斯坦因就收什么,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。斯坦因不懂中文,也没有能力挑选。他的助手学问也不多,在挑选方面似乎也没有帮什么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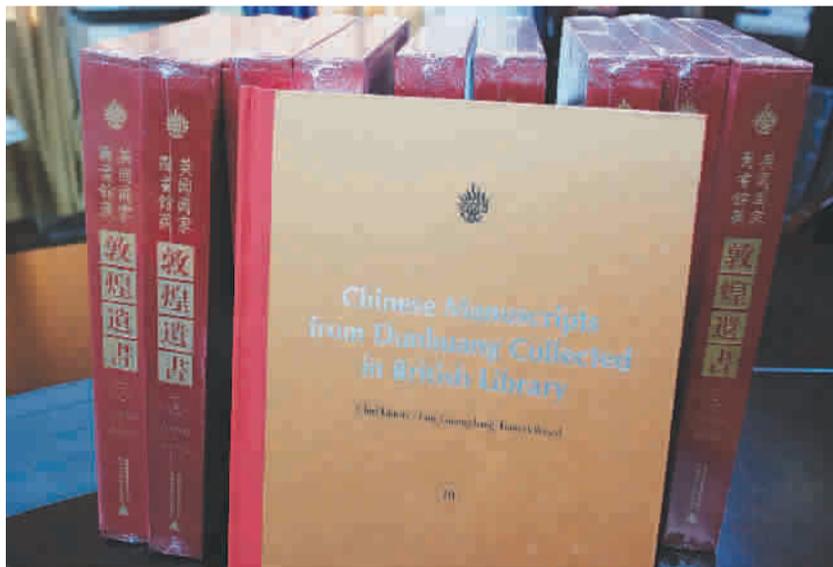
其次是伯希和。他是一个汉学家,中文不错。他虽然进入藏经洞,得以任意挑选,但他不懂佛教,而藏经洞遗书以佛教为主,这就限制了他的挑选水平。其实,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,非汉文文献。至于佛教文献,他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、带有题记的、抄写精美的卷子以及佛经目录等。虽然伯希和自称经过他的翻检,精华已经完全选出,但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大话,剩余的精华仍非常多。

1910年,敦煌遗书启运北京。到了北京以后,有关人员上下其手,监守自盗,这是敦煌遗书的第三次浩劫,后果相当严重。这一次把非佛教的精华文献几乎偷盗一空。只是因为他们对佛教不甚熟悉,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的、带有题记的、抄写精美的等几个方面的卷子,因此,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。值得庆幸的是,解放后,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,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、



“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展示发布会”近日在沪举行

刘志惠 摄



方广钊等主编的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前10册

刘志惠 摄

博物馆。当然,还有若干现在还流散在私人手中,或者流散到了国外,主要是日本。

方广钊说,北图的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第一位,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。当然,不同的研究者,研究的侧重点不同,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。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,会觉得英国、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北图;而研究佛教的,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北京图书馆。

赴英国收集相关资料遇阻

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14000号,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方广钊研究的重要对象。从1991年到2009年间,他曾7次赴大英图书馆做学术收集工作,得到了包括Frances Wood(吴芳思)博士在内的多位英国学者的大力支持,并将阶段性成果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(斯6981号—斯8400号)》赠送给了该馆。但在工作中,大英图书馆的“国际敦煌项目(IDP)”人员却对方

教授设置了种种困难,并无礼地要求方教授签下“授权书”,同意将他花了近二十年心血的编目成果电子文本交给英方。

对此,方广钊曾致抗议信给大英图书馆馆长。在信中,他义正词严地说:“馆长阁下,你想很清楚,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、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,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。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。作为一个敦煌研究者,我主张在历史问题尚未解决之前,开放所有的敦煌遗书,采取合作的态度,供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使用。作为中国学者,我可以与世界任何一个平等对待我的国家、单位、个人合作,但绝对不会答应企图强加给我的蛮横霸道的所谓‘授权书’。”

“敦煌遗书库”工程已启动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方广钊利用数据库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,逐渐认识到可以用现代数据库技术建构一个“敦煌遗书库”,全面挖掘敦煌遗书内涵的各种知识点,

【焦点关注】



方广钊在研究资料

图 TP

2004年5月,方广钊被上海师范大学慧眼相中,从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研究所聘来做全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校长张民选对当年引入方广钊的细节记得十分清晰,更对方广钊这些年来心无旁骛埋头学术的精神赞不绝口。

虽然是从北京引入的专家级人才,但方广钊却能说有点生硬的沪语。原来,他出生在上海,读初一时随支内的父母去了新疆。“文革”时期,方广钊当上了农民,后来调入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教语文。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,没有上过一天大学的方广钊,竟一下子直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亚系的硕士生。

年过花甲的他,每年都会辟出固定时间到上海来工作,即便是回到北京的寓所,也是成天泡在敦煌研究的浩瀚史料中。要采访方广钊很“难”,因为他不用手机,也没有手机,好不容易打通座机,他也必须先放下手头上的工作。“我是为了避免一切外部干扰,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状态中去。”

“1984年我考取任继愈先生的博士生,正是从这一年起,我开始在任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敦煌研究工作。”说起自己的恩师,方广钊充满崇敬之情,“我今年64岁了,不完成任先生交给的工作,我对不起他。不瞒你说,任先生去世时,我哭过好几次,但我更多地是在想,怎样抓紧有限的时间把先生交代的工作做好。我的生命只有一次,决不能让它白白地浪费掉。我想,我们都应该以这样积极的态度,去对待生活以及生活中的一切。”

不用手机,只为埋头工作

形成敦煌遗书的知识网。“在这个基础上,如果再开发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工具,引入现有的实用工具,将可为敦煌研究者提供一个高端的网上研究平台。”方广钊说。

在方广钊和他的研究团队心目中,未来的“敦煌遗书库”拟设置“普及版”和“专业版”两大块。

“普及版”的对象是一般公众,任务是普及敦煌学知识,以提高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、历史文化知识和敦煌学的知识水平。在“普及版”里将有敦煌介绍、藏经洞及文物流散史、精美石窟、壁画欣赏、敦煌史学、互动论坛等内容。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上,任何人都可任意浏览、发表文章、跟帖评论。

“专业版”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为专业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、帮助确定选题、评价研究成果、从事实际研究的多功能的高端平台。它将为敦煌遗书总库、研究数据库、古籍库、敦煌知识库、壁画资料库等。

据悉,这项庞大的“敦煌遗书库”工程已经启动,并取得了初步成果。